

没有信仰也会挨打

□ 顾伯冲

公元1580年，也就是明朝的万历八年，西班牙耶稣会修士阿隆索·桑切斯在马尼拉致信该国设在马德里的西印度事务委员会，力劝政府出兵攻打中国、征服中国。当时，中西两国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纠纷，这位修士缘何提出如此建议？道理很简单，正如他在信中所写道：“中国人甚为聪颖，皮肤白皙而样貌悦人，其人高贵，其国富庶，与印第安人殊绝，除却信仰与勇力，其余皆胜吾人。”中国人没有信仰、缺少勇力，是他们要打的依据。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是斯大林在1931年所作的《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中提出的，现在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从一个侧面为这种论断提供了有力佐证。诚哉斯言，落后指的是国力的落后，其中包括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但战争的最高层次是灵魂之战、信仰之战，而不是单纯的国力之战、军队之战。战争之伟力的雄厚根源在于民众之中，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国力就是相对落后一点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挨打；缺失了自己应有的信仰，即使国力再强大，也同样逃脱不了挨打的命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信仰是综合国力的根系

信仰是什么？托尔斯泰认为：信仰，是人生的动力。诗人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这些是艺术家对信仰的形象比喻，勾勒出了信仰的某一方面特征。

“信仰”，一个抽象的词汇，而就是这个抽象的字眼，反映了一个人的

价值观和人生观。从本质上讲，信仰是人的心灵被某种主张，或说教，或现象，或神秘力量所震撼从而在意识中自动建立起来的一套人生价值体系。在世俗社会里，信仰是人们对某种理论、主义、学说的信服和尊崇，并且把他们奉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和行动指南，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人们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安慰，实现了对自身生命的超越。不同的信仰，反映的是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体现的是观察事物的不同的方法论，同时释放出不同的力量。先进的信仰能够在精神世界中发出巨大的力量，托起沉沦的人生、点亮心灵的灯盏，给人一种精神的仰望和生命的活水。植根于信仰沃土中的力量，才是充满底蕴的力量、永恒且有韧度的力量。

信仰大致分为科学信仰、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三者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其中政治信仰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但政治信仰的确立离不开科学信仰的背景，宗教信仰对政治信仰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有时两者甚至交织在一起。政治信仰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实践的特点决定了社会政治信仰的大体形态。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主流政治信仰，它能控制整个社会的道德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换句话说，政治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民族或个人的终极目标。力量生于信仰。比如，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就决定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再比如，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性的追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都是我们坚持政治信仰的具体表现。政治的稳固和发展必然需要信仰，如果失去了政治信仰，那么国家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动力也就失去了，国家稳

定、民族团结就很难实现。

在充满竞争的世界，政治信仰与综合国力是一个孪生体。国家对政治信仰确立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综合国力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映。不论信仰与国力策略调整孰先孰后，国力依赖于信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的定律。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仰，并且不断培育坚定信仰的勇气和禀性，否则国力与文化无以依附。一个民族凝聚政治信仰的能力，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本。

没有信仰的国力如同一堆瓦砾

一个人需要信仰，一个国家需要信仰，信仰是成“人”之基、立国之本。没有坚定信仰和价值追求，没有人文精神支撑，社会和谐、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这些都只能是空想。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信仰缺失就会失去方向感。国家学说中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要使国家强盛，首先要满足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三大心理：方向感、安全感、归属感。一个国家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有顺利的时候，也难免有挫折的时候，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不顺利的时候，哪怕是受到艰难险阻，国家的方向感绝不能模糊，即国家朝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信仰缺失就会走向堕落。信仰是一个民族坚守的精神高地，也是执着笃行的内在动力。如果一个民族连最基本的信仰也缺失的话，那么就会开始堕落，而堕落的民族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道德，更谈不上有什么高贵的气节存在。“杀身成仁，舍生取

义”，为了信仰而坚持，为了理想而奋斗，这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种精神，是一种大至至刚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情怀。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信仰缺失就会失去凝聚力。社会凝聚力是对社会的一种认同和归属，而社会凝聚力始终以先进信仰为内核，空洞的灵魂所造就出来的只能是一个苍白的世界。当国民信仰体系极度弱化，是无法长久支撑飞速发展的社会和频繁出现的困难的，社会发展就会一路跌跌撞撞，起伏伏。凝聚力决定战斗力。就像人的一只手，手掌的力量与握成拳头的力量是不能比的，当大家都团结起来，那么我们的战斗力是不可言喻的。

对于每个人来说，信仰缺失就会缺少自我约束。如果缺乏了信仰，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只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并都找自己行为的道理，那么在各个行业和各领域生活中的人们就没有基本的共识。一心为己，一盘散沙，哪能不任人宰割呢？舍弃了道义，抛弃了信仰，又该去哪里来安顿不安的心灵呢？

坚定信仰重在于“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谆谆告诫全党。2012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还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仰问

题的重要论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共产党人培育人生观、价值观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既贯穿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红线，同时体现着共产党人“永不动摇信仰”的底线，对于进一步夯实共产主义信仰的基础，进而持续提升我们的综合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执政党的层面上讲，坚守信仰是“强魂凝神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作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地域和历史、文化大国执政的执政党，因信仰而生，也因信仰而发展强大，必须保持那种伟大和鲜活的信仰作为“强魂凝神固本”的基础工程来抓。持之以恒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以此铸成普遍的价值基础，形成相应的思维模式、判断标准与思想准则，同时不断加强党的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任何情况下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从而，将自身信念信仰体系转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内心信念、坚定信仰，使之建构起与社会理想、民族信念和国家信仰具有同构性内涵的信仰之魂，慰藉心灵、引领方向、内化使命，形成支撑社会成员生命追求、团结奋斗的充实意义世界。

从国家的层面上讲，一切施政行为都要与倡导的信仰相匹配。施政行为是执政党对整个执政活动总的观念和理性认识，它贯穿于整个执政过程，是执政行为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取向。其中，执政理念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一个政党的性质，是判断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准，同时也是凝聚全体人民坚定理想信仰的根本标志。毛泽东曾讲：“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施政行为具有强大的导向功能，发挥着“指

挥棒”的作用。对人民群众来说，理想信念的坚定不仅依靠朴素的感情认知或组织行为的刚性要求，而且取决于人们认知的理性程度。只有经过人们的反复比较形成独立思考和理性选择，才能过滤转化为扎根于心的理想信念，而政府的施政行为是他们最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比较与选择的参照系。

从社会的层面上讲，要把利益认同与价值认同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利益。对广大群众来说，理想信念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利益。“共同”与“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共同”的政治前提是由相同的价值所凝聚起来的根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富裕”的物质基础是由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因此，在“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定放飞价值认同这个思想精灵，寓价值观于利益观之中，从而产生出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做到民生改善一步，共同的理想信念坚定一层。同时，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大框架下，把“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高级、多元、多层级、稳固的国民信仰体系。

早在1922年梁启超先生就说过：“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他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最大的病根是没有信仰，因而改革“最要紧的是确立信仰”。而今，信仰仍是一个人的元气、一个社会的元气。如果没有了信仰，失去了元气，那么这个人或是社会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更不用说挨打了。

理论解读

从供给视角认识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 连轶源

研究和提升国家治理，需要回答和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谁来治理，即治理主体问题；二是治理什么，即治理内容问题；三是如何治理，即治理方式方法途径问题。这三个问题，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其中治理主体问题居于核心位置。

国家治理属于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有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社会不断发展，多元主体出现，需要有所不同过去的国家治理体系与之相适应。一般认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方面，相应地，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就是现代国家治理中三个最重要的主体。但这并不是说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就无足轻重。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统摄、贯穿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发挥着根本作用。

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立足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的特征。当代中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各种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也前所未有，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核心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最大的实际。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是把握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战略、统筹各方力量、协调各方利益、理顺重大关系，形成全国一盘棋。党的领导，主要是对政府和社会各类主体进行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依据这些基本内容，我们可以从领导亦即供给的视角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一是价值供给。对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来说，核心价值观就是黏合剂，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共同的价值追求塑造了共同体意识，主导着国家治理文化内容和形态。法国思想家阿

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指出：“政治社会的建立并非基于法律，而是基于情感、信念、思想以及组成社会的某些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习性。”中华文明能够绳绳相继，在不同时期融合不同民族，根本的就在于儒家伦理和“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形象说明了传统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西方国家立国时间都不长，国家人口规模都不大，但在国家治理中也都强调“立国价值”的重要性 and 神圣性。缺乏价值观的凝聚，一个国家就会混乱，发展下去就会解体。当代中国社会深刻变动，面临着政府与市场、平等与效率等诸多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的困境，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形成核心价值观作为最大公约数，是国家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能够反映时代潮流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提炼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样“三个层面、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在协调和平衡各种价值体系基础上，为正确处理国家、社会 and 公民关系，从而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导向。

二是制度供给。国家治理，在中观层面上就是制度。国家治理的主要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国家制度的集成和总和。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样一个作为人民民主政权组织形式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基本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文化方面，开展了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的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在如此等等大的制度框架下，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等，还有一系列具体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形成的这样一整套有机、协调、动态、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由根本层面的制度、基本层面的制度、具体层面的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组成。之所以说它是动态的，就在于制度是治理探索的凝结和积淀，同时也要随着时代变迁和治理实践而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对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提出明

确要求。随着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邓小平当年指出的“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三是组织供给。人们总是根据一定的关系、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是常识。所谓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没有社会组织，而是缺乏权威组织。政党是近代以来出现的、按照一定政治目标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一般具有跨越性别、族群、阶层、地域的特点，随着时代演进愈来愈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近代以来，不仅有了政治组织，还产生了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不同的组织进行的治理。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中国社会运行起主导作用的组织。它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了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集中了全国数量众多的先进分子和各方面优秀人才，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党和政府以体制性的方式全覆盖嵌入社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人们就业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政府以体制方式直接控制的领域和范围逐渐缩小，但8900万名党员和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仍然深入生长在社会之中、生活在群众之中，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强大的组织。基层党组织遍布社会上的各个基层单位，是党与社会、与人民群众接触和联系的前沿阵地，既负责向人民

群众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又承担着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对社会起着直接的表达和动员作用。适应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成为重大现实和紧迫的问题。为此，党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积极探索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坚持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优化、强化组织供给的实际行动。

四是能力供给。国家治理，需要治理体系的维系，更需要治理能力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实践中的绩效彰显，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杠杆。治理能力是由治理体系决定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的自主空间。治理能力，不仅包括运用治理体系的能力，而且包括改革和优化治理体系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这一点不仅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所证明，更为新世纪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动荡不已而我国稳定发展、连续迈上新台阶的国际比较所昭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功，自然得益于中共强大的治理能力。这个能力即使和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诚然，世界上，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整体带入现代

化，既没有对外掠夺和殖民，也没有对外转嫁矛盾和危机，而完全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样的模式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突出表现为长远规划的能力、高效执行的能力、选贤任能的能力、兼收并蓄的能力、危机治理的能力、改革创新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不会被强大的资本力量所挟持，也不会被众声喧哗的民粹情绪所裹挟，而是始终服从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够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长远规划和高效执行。选贤任能、兼收并蓄、危机治理、改革创新，这些方面的能力来自中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根本上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

当代中国的国情是，我们有着5000年文明史，有着超过全欧洲近两倍的人口，有56个民族，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虽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生产总值还很落后，而我们前进道路上还面临着诸如“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风险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国情，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日新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保持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必须有充分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度的社会凝聚力。而这一切，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因此，深刻认识、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当代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理论研究